

《《》 厦门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研究丛书

经济体制转型中的 演进与理性

THE EVOLUTION AND
RATIONALITY OF
TRANSITION
OF ECONOMIC SYSTEM

二十世纪两次逆向经济体制转型
比较研究及理论反思

靳涛 /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厦门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研究丛书

经济体制转型中的 演进与理性

THE EVOLUTION AND
RATIONALITY OF
TRANSITION
OF ECONOMIC SYSTEM

二十世纪两次逆向经济体制转型
比较研究及理论反思

靳涛 /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体制转型中的演进与理性/靳涛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ISBN 7-5615-2400-5

I. 经… II. 靳… III.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IV. F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2247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福建二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8.125 插页:2

字数:216 千字 印数:0 001—2 000 册

定价: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胡培兆

历史与现实一线牵棋

背靠历史不忘本,面向现实往前走

1

主义的实践,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几经与天斗与人斗的曲折,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历经“斗私批修”的风雨,到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生动地说明了真理必须在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区别的把握中认识和运用。学术研究是继往开来的工作,不能搞今是昨非,只能是昨去今来。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己丰富的经济思想,如有“《大学》十章半理财”之说,但没有独立的经济学说。我们至今所有的经济学底本或叫母本,都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所以,论说起来和运用起来难免有西洋味。这也正常,哪个孩子没有乳臭?要紧的是要快快成长,能面对有 13 亿同胞的国情独立探索中国富强之路,做出积极贡献。西方经济学是必须借鉴的,但任何时候都要自觉避免媚外的倾向,数典不能忘祖。然而,这一点,就是今天都还很难做到。这可能是弱者常犯的毛病。20 个世纪 30 年代,就有人告诫过:“溯经济学之传入中国,于兹已四五十年,时间不可谓太短,而检讨过去,果有博通各国思想,针对中国国情与需要,而自成一体之经济学乎?蔑有也。”“还观吾国经济学界,犹停滞于接受外来思想之时期,不少学者且视为固然,各以其留学国或师承之学说为主臬,曾不思转而自谋创造。……此余对于中国现行经济学未能满意也。”(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须知,对中国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先进性是相对的,因为它们都以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我们研究经济学,只能以我国实践的需要来论定和取舍。凡适用我国国情的,不“先进”也先进,哪怕是不知名经济学家的学说;凡不适用我国国情的,再“先进”也不先进,哪怕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经济学说。不懂得这个道理,任何最“著名”、最“权威”的经济学,对当今中国充其量也不过仅有理论炒作的价值而已。

现在全球经济已有重大变化,实为今非昔比。如现代市场经济就充满现代气息,不可与亚当·斯密与凯恩斯时代的市场经济同日而语。如果说,过去的市场经济或是“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纯粹的自

因此,有些传统的市场经济的观念需要转变,不宜固守。如亚当·斯密首先感悟到的那只主宰经济人命运的“看不见的手”,已不再那么神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能见度越来越高,对它的驾驭力量也日益增强。国家对经济作调控性的合理干预,就是自觉利用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把国家干预和市场经济规律作用对立起来。又如,对财政政策的评价问题。财政政策有两面同一性。国家实行扩张性的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都是调控宏观经济的必要手段。目的是同一的,就是要消除宏观经济景气偏冷或过热的现象,以求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一直以来,只把拉动需求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视为国家干预范畴,而不把加强供给管理以优化供给的财政政策同样看作国家干预范畴,就失之偏颇。需求管理固然是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责,但供给管理现在也不再只是市场单方面的事,不能再把两者对立起来。

3

给与需求管理,提高综合竞争力。对拉动需求和优化供给,国家有同等职责。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习惯把扩大需求认定是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责,而把优化供给看作是市场的事,把两者对立起来。所以在强调拉动需求时,对优化供给问题就让人有讳莫如深之感。西方经济学中,供需两派的理论历来是互相抵牾的。最早以需求不足来解释生产过剩问题的西斯蒙第就与李嘉图针锋相对地辩论了多年,直至李嘉图死后,还与李嘉图的学生继续争论不休。

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是供应学派还是需求学派的理论,也无论是新自由主义学派还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理论,对我们中国来说,它们都是为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工具,绝非是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因此对这些引进来了的贴着洋商标的舶来品,都应当经过严格的检疫鉴别处理,按我国国情需要,取其可用者,舍其无用者,完全没有必要把西方学派的犄角之势搬到中国来互相对峙,去特别热衷地褒扬一派学说而贬低另一派学说,以免让人误以为中国是要崇尚或贬损这派那派而增加盲目性。现代西方经济学不论这派那派,对社会主义中国所取的态度都是一个派,就是要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纳入全盘西方式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自由主义自然不用说,就是被胡佛误以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干预主义始祖凯恩斯也明说他写《通论》是要推翻“李嘉图—马克思的理论”,反对“没有教养的无产阶级”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从政治立场和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热一派冷一派。只能奉行一种态度:不厚此薄彼,一样地批判和借鉴。

本丛书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成果。作者大多是在本学科从事教学科研的年轻博士。他们有思想、有雄心、有激情、有闯劲,后生可畏。眼下的著作虽然谈不上是圆熟的,瑕疵甚至错误都可能在所难免,但却是他们从深层挖掘出来的璞石。政治经济学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充电”才能不断发光的。真希望他们永远是政治经济学的充电手。

政治与经济同心结棋

本名政治经济学，通常简称经济学

亚当·斯密在其大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说：“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他在批评英国重商主义者热衷鼓吹金银是唯一财富时也说，追求增加贵金属“应当是该国政治经济的大目标”。这些学说在当时影响之大，使得“君王和国家的政策亦为它们所左右”。我们从此也可可见一斑：政治经济学作为重商主义者最高智慧巧立名目提出来的——一门富国裕民的学问，一开始就是被君王、政治家、立法家所青睐和推崇的，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立国方略的理论依据。在富国裕民这个大目标上，政治与经济应当是同心结的。斯密继承前者的目标说，也认同政治经济学的大目标是“增进本国的富强”。

政治经济学简称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历来并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就是这样。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里，“古典政治经济学”（26卷一Ⅲ，第555页）、“古典经济学家”（26卷一Ⅲ，第555页）、“政治经济学家们”（26卷一Ⅲ，第300、301页）、“庸俗政治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家”（26卷一Ⅲ，第554页）就常并用。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里称“近代经济学的建立者，威廉·配第爵士是最有天才最有创见的经济学研究者之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这里讲到的“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不过，西方过去以政治经济学的本名用得最为普遍，现代却是几乎都用简称经济学了。这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新生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说的百科全书，一切关于生产、分配、消费的经济原理定理和工业、农业、商业、外贸、财政、金融等等经济问题的论述，都兼容并包在其中。后来，特别

是现代,政治经济学是大大地发展了,包罗在其中的各经济学因子都分离出去独立发展成许多分支学科,分门别类地形成了许多部门经济学或专业经济学,而且还有越分越细越多之势。政治经济学也就由原来独树一帜的地位变为多学科大家族中的寻常百姓家了,但瘦掉的骆驼比马大,它仍居鳌头的总领地位。萨缪尔森在其广为传播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学》中说:“作为学术上一门学科,经济学已经有了整整二百年的历史。”“经济学——或用更合乎传统的名称,政治经济学——已经经历了许多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是最古老的艺术,最新颖的科学——的确,它在社会科学中,居于首要地位。”(《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政治经济学的广义性和基础理论性能驰骋各部门或各专业的经济学科,而为其他学科所不可比拟。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搞部门或专业学科的人往往不喜欢戴“统计学家”、“财政学家”、“金融学家”之类的帽子,但唯独企求有“经济学家”的称号。

在中国,20 世纪上半叶,大学讲坛上的政治经济学基本上都叫经济学,有许多冠名《经济学》的教科书。下半世纪才都叫本名政治经济学。50 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曾有过空前红火的辉煌时代。因为在教学和运用中受不良倾向的影响,政治经济学脱离现实的教条问题在改革开放中就逐渐显露出来,使这门科学的声誉受到极大的伤害,直到今天都还不易恢复过来,以致让浅薄者嗤之以鼻。但事实上,正是处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前沿的经济学家们,为经济体制改革贡献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突破性成果,不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使命。鉴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在我国似乎特别容易被误解误用的情况,也鉴于政治经济学今天的发展情况,我认为,特别说明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是完全有必要的。而对那些读不懂政治经济学这个高雅学科名的人来说,就用简称叫经济学或许更好。因此我们这套政治经济学丛书,也就是经济学丛书。

2005 年 6 月 20 日

序一

靳涛是名校名师培育和陶冶出来的经济学博士，我们相识是他来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以后。他待人接物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不论遇有开心事还是麻烦事，交谈起来总是笑呵呵的，有克己从人的大度，没见他露过愠色，大家都说他这人很随和，很好说话，很好商量。我与他也是自自然然熟起来的，互相坦诚无介蒂，丝毫没有代沟感。他把自己的著作《经济体制转型中的演进与理性》捧给我，谦逊地请我给他看看，如有可能劳神写个序。我也就不顾自己是否合适，欣然答应了。

20 世纪可说是大转型的世纪。有些国家转向社会主义，有些国家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转向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整个世界经济从区域化转向全球化。两次世界大战和 1929—1933 年经济大萧条，是大转型的楔子或说是第一级推进器。中国也处在这个大转型中，而且是世界大转型中最耀眼、最引人注目的大亮点。先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再在社会主义大框架里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的这两大转型，都以极大的震撼力影响和推动了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后期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的这个大转型，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和学者一直在密切地关注和跟踪研究着，并有许多著述，这是十分可喜的。经济学的研究本来就应当厚今薄古，当然也不能有今无古。靳涛的这部著作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把对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研究和 20 世纪上半叶后期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转型适当联系起来，进行对比分析。这不仅更能深刻、更清晰地揭示转型的本质和内涵，而且让读者能从社会经济

体系本身的演化了解我国发生两次反向大转型的原因。因此,将我国两大转型联系起来作比较研究,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看,都是有意义的。

经济体制转型,是中外经济理论界共同研究的一个大课题。如何转型,转型的类型,转型主要依靠政府来安排和推动还是主要依靠市场的自发等等,都是我们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学界的各种声音和理论都值得我们回味和深思。转型的研究是近年来国外学者和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从国外的研究来看,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主要是因为各自的研究主要缘于各自所代表的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框架和思路。转型之所以复杂,是因为转型是人类社会在较短时期内所发生的全面和相对剧烈的整体制度变迁,有很强的社会背景和实践性,它不是仅靠某种理论的简单演绎就能表述清楚的。研究转型必须深入了解转型国家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路径,必须从实践中来研究和提炼转型的一般理论和演进规律。当然,经济学要深入研究转型问题不能偏离规范的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否则不可能取得令人信服的分析结果。

作者在对 20 世纪我国两次相反方向转型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一个转型发生和演化的理论框架。通过对两次转型的对比研究,以事实为依据,以历史过程为背景线索,进一步认识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内涵。作者的这种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值得首肯和称道。作者认为转型中把握好政府自觉作用和市场自发作用的关系,使转型中由上到下和由下到上两种力量有机结合是转型取得成效的关键。这一点很有意义。另外作者提出的“转型的过程并不是在提出一个明确的目标后付诸实施的简单过程,而是一个逐步摸索和目标逐步清晰的过程,是在转型期的磨合和演化中逐步达到目标的”和“转型的成效不在于转型的速度,更重要的是转型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实际效果”都很有启迪。

一篇文章,一本书,值得称道的不只是洋洋万言,也不只是华丽的词藻和时尚的形式,而是精辟的见解和对现实的领悟力和洞察力。

有的书读过之后就掩卷而忘，不会在脑子中留下什么痕迹，而有的书却能让人不时地回味和深思，给人以启示。我想，本书能给读者留下的是后者的效果。通过对本书的阅读，发现该书最精彩之处可能集中在通过对两次转型的比较研究而得出的对转型发生和演进的认识上。

春秋一部书，诸子百家谈。作为序，博论的简评为上，我就不多说了。

胡绳

2005年5月

序二

现实与理论的冲突往往是理论发展的重要契机。转型经济学就是这样一个由于实践对理论的挑战而形成的新的理论生长点。原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实践,无论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突变后出现的严重衰退,还是中国的平滑转型过程中的持续高速增长,都是正统的经济学所始料不及的。标准教科书里的正规理论应用于转型问题上的失败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哲学基础,这需要专文讨论,这里不多谈。这里要指出的是目前学界已经达成的共识,主要是两点:一是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整套资源配置理论是一种制度不相关理论。它是在假设制度给定的条件下研究每个个体如何做出选择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因此,兰格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构造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或者说模拟市场的计划经济模型,可以得出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相等的结果,这实际上也就说明了一般均衡理论及在其基础上的资源配置理论并不适合不同制度的优劣比较,更不必说用来分析制度系统的转型了。二是缺乏历史的眼光。虽然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现代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了许多所谓的动态理论,例如含有时间因素的历时模型和跨期分析等,但是其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仍然是静态的或比较静态的,因此并不适宜于转型这种总和不确定条件下的大规模制度变迁的动态分析。转型研究需要扩大视野,把制度及其历史演化的动态过程纳入理论的框架,这也是制度—演化观点在转型经济学中流行的重要原因。

历史描述和因素分析是古典经济学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新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马歇尔也继承了这种方法,但是经过德奥两国学者方法论的争论,特别是随

着工具主义方法论的兴起,历史分析从现代经济学的视野中消失了。科学理论靠什么被人们接受?主要不是它的逻辑的优美,而是它的真实,也就是说它是客观的。因为,只有真实客观的理论才能在实践中发挥预期的作用,才能成为对人有用的知识。工具主义方法论把理论的有用性与真实性对立起来,鼓吹只要有用,理论可以不必顾及其假定前提的真实性,这就为构造脱离现实的数学模型的泛滥打开了方便之门。事实上,历史事实在社会科学中具有和自然科学中的实验与观测同样重要的作用,它是构造理论的基本的约束条件。因为理论模型的构造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但是历史事实却是包括偶然因素在内的唯一的客观现实,一个理论模型只有在符合这种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真实而有用的知识。诚然,理论模型是抽象的,并不是现实的精确复制,它舍去了许多实际材料和各种偶然因素,但是,它是一种反映现实的本质特征的图像,是比直接观察到的现实更加真实的客观事实。因此,经济学理论不仅应当与历史统一,而且理论逻辑必须符合历史,这就像物理学中的理论模型必须符合实验或观测数据一样。理论必须通过事实的检验,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就是理论必须通过历史和社会实践的检验。否则,理论的探讨就会成为一种随心所欲的智力游戏而失去客观的标准,那样,理论也就不成其为理论,而沦为神话故事或者纯粹的智力游戏。

近十几年,有关转型或过渡经济学的论著已出版了不少,但是靳涛的这部著作仍然应当占有一席之地。靳涛是我的博士生,这部著作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成的。靳涛这本书的第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的历史视角。他是把转型当作一个历史过程加以研究的,不仅仅考察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而且把它与20世纪前几十年中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加以对比,也就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生、发展和转变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考察它的建立和转型。这在转型经济的研究中还是首开先河的。由于有了这种独到的眼光,从历史的纵深观察转型,视野更加开阔,从而他提出了转型的三

个层次的概念,即体制的转型、社会的转型和文明的转型。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和普遍关注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种体制的转型;体制的转型再加上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就是社会的转型,例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其实 20 世纪最初 30 年中国社会从晚清新政经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到国民党当政,也是这样一种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再加上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例如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就是文明的转型,中国自 1840 年以来就一直处在这样一个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对转型的三个层次的划分有利于我们对转型中的各种因素的定位和区分,从而有利于转型研究的深化。这是靳涛在本书中做出的第一个贡献。

靳涛这本书研究的主题是有关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两种基本力量即自发演进与理性构建二者的关系的问题。所谓理性构建,是指通过主观的理论设计或者社会主体主要是政府的自觉行动推动社会制度的发展和改变。这种思想观念是随着科学主义在欧洲的兴盛而逐渐流行起来的,它在社会实践中最典型的实例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而自发演化的观念是指,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和自发的演化过程,也就是一种连续渐进的过程,因而反对人为的设计和政府的干预。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和转型中激进策略的受挫,在制度变迁和转型经济的理论研究中自然演化的思想开始得势,对理性构建的否定一时成风。然而事实上,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既不是纯粹靠自发力量作用的结果,也不是完全的政府和社会理性作用的产物,而是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结果。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不可否认,在长达几百万年的长期历史中是由自发演化的盲目力量在起主导作用,但是随着文明的曙光初现,人类就一直在追求理性的道路上探索发展的,人类的理性在精神领域表现为科学理论,在实践领域表现为政府的自觉行动。尽管人类的理性是有限度的,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发展到能够完全控制自然和社会的程度,但是人类总是力求更加自觉,也就是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影响和控制环境,把握自身的命运。如果否定了

人类理性的作用,也就是否定了人类的文明本身。因此,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在社会理性和自发演化二者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要探讨二者各自作用的范围以及它们共同作用的具体形式。靳涛的这本书就是这方面的拓荒之作。他通过对 20 世纪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两次方向相反的转型的比较,分别从两次转型发生的缘由、目标、方式、政府作用等几个方面揭示了转型发生和演进的内在逻辑。这是这本书的第二个突出特点。

靳涛这本书的第三个突出特点,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研究中运用博弈论方法提出了一个双层次互动进化博弈模型。他提出,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存在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和企业等微观行为主体与地方政府之间两个层次的博弈,基层的经济行为主体根据自身利益目标做出的制度创新,需要通过地方政府作为中介,才能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并最终成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而确立,而这种微观层次的“突变”和宏观层次的“选择”的共同作用,正是体制转型中的理性和演化两种作用结合的机制。这也正是靳涛在本书中做出的第三个理论创新。

诚然,靳涛的这些理论探索还只是初步的,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深入,其中有的问题还有商讨的余地,但是作为一篇博士论文能够在学术上做出这样的创新已属难能可贵,我作为他的导师实感欣慰,因此乐为他的这部著作作序。

周冰

2005 年 5 月

摘要

20 世纪发生了两次重大事件,一次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许多国家从不发达的市场体制和半封建体制走向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而第二次是在 20 世纪末这些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国家纷纷又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转回市场体制。从 20 世纪发生的两次大的经济体制的变迁来看,这两次方向相反的变迁虽然发生的背景和演化的方向不同,但它们都是经济体制的巨变。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应该称之为转型。从目前来看,对两次转型的单独研究都有不少的中外学者予以关注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对两者进行对比分析,尚较少有人做此类尝试。笔者希望在两次转型对比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转型发生与演进的内在逻辑。

第一次转型是在外部压力和社会矛盾激化下民族振兴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建构和社会革命的产物,是当时市场体制弊端激发下人们对新制度探求和尝试的结果。而第二次转型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率呈下降趋势的背景下,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所造成的低效率和结构扭曲的矛盾中,在不断对社会主义计划体制进行改良和计划加市场的试验中,逐步由量变走向质变的过程。

通过对两次转型的目标、性质、方式,国家主体在两次转型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比较,我们发现,生存和竞争压力下的社会利益矛盾是推动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中的人类理性和政府作用是重要的,但其作用不能超出客观的限度;转型中把握好政府作用和自发作用的关系,使转型中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两种力量有机结合,是转型取得成效的关键;转型的过程不是在提出一个明确的目标后付诸实施的简